读者来稿|如何逆转杀贫济富的武汉医改?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读者来稿|如何逆转杀贫济富的武汉医改?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武汉的医保改革在2月8日引发了上万退休职工上街游行示威，一个标志性举动就是在粤汉码头毛主席像下方高唱国际歌。因为对政府的回应不满，群众宣告他们将在2月15日召开维权大会，要求政府停止改革措施，但因专制政府的提前准备而被压制住，没有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此外，我们已经见到广州的退休人员三次前往当地人社局抗议，并维持着一周两次的上访，大连的退休工人在人民广场政府大楼前抗议改革，喊着大连市长的名字，要求其出来解决问题。

这轮医改究竟改了什么，才挑起退休工人们的怒火？我们知道中国的城镇职工医保自建立伊始就存在个人账户与统筹基金两部分，统筹基金由企业缴纳一部分与政府资金拨款组成，只负责少数大病慢病的治疗报销，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与企业缴纳的一部分资金组成，负责补贴剩下所有疾病的治疗。这次全国性的医保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个人账户，也可以简单称作个账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①减少个人账户的资金，转为由统筹基金管辖，取而代之的是普通门诊也可以通过统筹基金进行有条件的报销；②个人账户可以由家庭里的亲人共用。这只是一个过渡性措施，以后还要将个人账户彻底取消。

那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看待这一轮医改？现有的合法报道除了对政策统一口径的解释，就是御用民间媒体的偏颇辩护，墙外一些左派同志的文章则重点关注群众斗争的情况与策略，采写了许多群众的发言诉求（如武汉2.15群众运动简要总结）。而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对个账改革本身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让左派同志们对这次医改的性质判断有理有据，落到实处，并能够增强说服群众、教育群众的效果。

一、反对何来：“有利老人”的医改为何招致老人抗议

武汉医保改革事件的后续处理是反常的高调，我们简单列举：武汉政府深夜给所有武汉市民连发三条医保改革的解释说明，一篇附有群众上街图片的企业公众号文章，竟能被国家医保局公众号转发（见公众号“医保电子凭证”文章《能把医改最大受益人忽悠到上街反对医改，这洗脑本事真是绝了》）。总之，尽管专制政府百般巧言饰非，但居然破天荒地公开承认了群众上街游行的事实！

如此“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真的错怪了老爷们的善心。仔细查看网上千篇一律的解释说明，却会发现好像还真是这样，统筹资金的增多，在短期内肯定是调配身强体壮的青年人账户上的资金补贴慢病大病为主的老年人。但是，我们得再问一句，就算是有人恶意造谣，那在这“对政府信任度最高”的“人民国家”内，为什么规模庞大的老人们能集体上街反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难道他们的理解力都能低下到如此程度？财新的一篇报道不经意给出了回答（财新网文章《退休职工质疑医保个账

资金变少 账户结构调整遇阻》，已被删，此文虽也是辩护文章，但由于材料详实，没有重复官媒解释政策的话语，也难逃404命运，中国的政治高压可见一斑）：

> “...李芳认为，武汉此次个人账户改革虽然在半年前进行了意见征求，但宣传普及力度仍不够，'家里老人对政策的调整完全不清楚 '。此外，她推测，改革落地的时间恰好赶上了新冠疫情结束，大家很容易将个人账户金额的减少与医保基金在疫情期间支出联系起来，引发舆论争议。”

从老人们群起抗议医改和民间对医保资金短缺的质疑声中，我们能够总结出两个问题：

其一，官僚改革前未对政策进行充分宣传解释，傲慢的姿态暴露出专制政府的本质：官僚有权而人民无权。恰恰是官老爷们就像是牧羊人一样，高高在上地为羊群指明了他们命定的幸福所在。而退休职工们两眼一抹黑，只知道他们买药的账户里钱这个月少了两百多，一合计就上街要求恢复原样。想必官老爷们顿时觉得自己高贵的心灵受到了愚民们的玷污，才想起来要好好地做宣传，好歹要讲明白自己已经实行也绝不会更改的政策。专制政府傲慢到能够不屑于向民众讲解自己的“福利政策”，结果发生了只能在漫画中才能看到的奇妙误会引发的冲突。但我们可不是只能看到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纯洁善心的中二少年，一切要求进步的人士都能看到，专制政府的威福自用到了一个何等的程度。而官僚有权的另一面就是群众无权。因此，这恰恰是中国官僚机构高傲的表现，恰恰是群众没有政治自由，切身利益被随意决定的结果。

其二，为什么“与医保基金在疫情期间支出联系起来”就能“引发舆论争议”？无独有偶，上文提到的那篇为专制政府叫冤的文章中列举了三个“恶意编造”的谣言，其中之一就是“个人账户钱少了是因为核酸花光了医保的资金池”。 这个推测能够有一个暗含前提，那就是大家都不想花自己医保基金去弥补疫情的支出，尤其是去年的大规模核酸。也就是说群众认为医改与防疫透支医保基金有关，反映出群众对三年抗疫，尤其是2022年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后逐渐常态化的全民核酸政策的不满。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而无用的典型做法。因此，虽然这种联系未必是事实（大规模核酸筛查时期的核酸费用多由地方财政负担），但却正确反映了群众对防疫政策的不满愤怒和对专制政府毫无信任。这也说明，新闻联播中“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这样的调子唱得再高再响，也不能改变事实，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二、改革动因：养老压力下不得不改的困局

个人账户是一个历史产物 ，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其从产生到日趋消亡的历史进程，找出造成它当今消亡趋势的那些客观的历史环境因素。

因此，我们首先要考察个人账户形成的原因，上述国家医保局转发的辩护文章中将个人账户的产生全部归结为技术因素，认为98年医保（此时只有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在农村要等到03年，在城市要等到07年）要走纸质报销流程，如果感冒发热这样的小病小灾都要将所有证明材料整理好，然后递交财务报销，流程慢、繁琐而工作量大，群众受不了工作人员也受不了。有些文章还指出个人账户是对新加坡医保制度的借鉴，但解释不了为什么要向小国新加坡学习，而不是直接向美国那样全盘商业化，或者像英国一样进行全民免费的医疗保障体系呢?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分析事物要关照它在历史中的前后关系。将现行医保制度放在中国社会主义从革命到复辟的历史中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对立面）而出现的。1988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劳保医疗制度改革，1998年开始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也正是药价腾贵，医院私有化愈演愈烈，大下岗即将到来的时刻。作为劳保的对立面，医保要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要降低对民众的医疗投入，所以职工医保相对劳保医保报销能力降低；而作为劳保的继承者，不能断绝旧职工的希望，不能让他们连医院大门都踏不进去，否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医保采取现行形式只因为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以后，从上至下、逐渐肃清“社会主义残余”的改革手段。通过降低医疗费用，减少用工成本，为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下游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准备，以便获得足够廉价的人力来生产巨额剩余价值。

我们不妨再考察一下不得不改的原因。个账改革是为了把健康群体的资金归入统筹基金，应对医保资金池压力日渐增大的情况。医保的压力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包括：①人口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高生养成本与过去长期僵化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②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导致的日渐支绌的国家财政能力；③逐渐增加的医疗费用等。后两个因素，经济下行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运动的逻辑有关，需要结合经济形势考察；医疗费用的增加要考虑随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变资本比例的增加，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崩坏有关，这直接导致医疗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直接原因，即人口问题。

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这是61年来的首次，比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要早九年以上。根据21年的预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进一步增长到2025年的15%、2030年的19%和2035年的23%。根据另一报告（任泽平团队《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2022》），2020 年老年抚养比19.7%，预计 2050 年突破 50%，这意味着要从5个年轻人赡养一位老人变成2个年轻人赡养1位老人。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还代表慢性病、重病数量的成比例增加，单次治疗费用与治疗次数的上升共同导致卫生经费压力增加。医保的资金压力究竟能有多大？由于专制政府一贯的政治黑箱和信息封锁，我们难以具体测算，但可以参考既有的学术研究。有文章统计了多位学者对“当前政策不变”前提下医保基金出现赤字的时间预测，大多认为2024-2027这个时间段将出现当年收不抵支，近20年内将出现医保破产。可见现行医保制度已是积弊难返，不得不改。

三、改革实质：杀贫济富不触动根本利益的虚假改良

正如开头所述，医保基金是由国家、企业与个人三方面出资组成。当医保基金面临压力，个人账户改革实际是资金内部的结构调整，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更高效地利用基金，但上文已经提到医保资金短缺的严重程度已经不是现有资金高效利用，而是总资金量绝对不足的问题了。而最直接也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增加资金池总量。那么国家、企业难道是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吗?

首先，根据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的卫生总支出占GDP比例，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不过是5.4%，别说北欧和美国，连日本、韩国与巴西都远远比不上，乃至于俄罗斯、柬埔寨都要比中国略高，再考虑到人口密度，人均就更谈不上了；同年的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占比也差不多，只与卢旺达、肯尼亚、马来西亚肩并肩。总体而言，别说与发达国家或者福利社会相比，政府投入比例就连中

等发达国家都远远不如，甚至不如更贫穷落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财政投入中的绝大部分也并没有用于群众医疗，而是用于保障官僚们的医疗特权。中国的官僚们按照级别享受干部医疗待遇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据国内媒体报道，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在公开演讲中说“中国8成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为党政干部服务”，虽然这一说法大概由于泄露天机后来被当事人否认，但这位副部长在改口后还是不得不委婉地承认：“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6%，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我们850万公务员占了里面的绝大部分卫生资源。”

其次，如果仔细考察武汉医保统筹基金的历史收支情况，我们会发现2019年以前统筹基金累计亏损数十亿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缴纳的医保基金不够，据学者谌琦等人的调查，有50%以上的参保职工所在企业，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60%这样一个法律规定的保底金额给他们缴费。当年成立的武汉医保局，通过加强征缴，做实企事业单位的缴费基数等措施，统筹基金才实现了当期略有结余。

如果单从解决中国医保资金不足问题的角度来讲，那应该：①让国家增加投入，至少要比发展中国家投入高，并逐渐追平中等发达国家；②追缴企业欠缴少缴的保费，就算难以追缴，也要增加企业以后的缴纳，再不济，也要让资本家哪怕就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医保才对。但是，真正活在现实社会的每一位打工人都能清晰地告诉你，资本家蛀虫们偷盗人民的五险一金到了怎样猖獗的程度。最不应该的就是挪用群众账户里的资金，毕竟亏损不是因为群众少交了钱。因此武汉的个账改革实际上是在用群众个人的钱来填资本家造成的缺口。

更何况，医保的运行向来不公开，统筹基金怎么使用，以中国群众如沙俄时一样无权过问国事的情况来看，难道不会一如既往，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被随意决定？这些资金就算不是被调配去弥补核酸亏空，难道真的会被官僚们忠实地用于治病救患吗？落马的老虎苍蝇们已经给出了足够有说服力的答案。

总之，既不增加企业卫生支出，甚至不能保证、不能追缴资本家应该付出的医保投入，也不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仅仅是搞一些个人账户与统筹基金的比例改变，仅仅是不痛不痒的微小改良。因此这一轮医保个账改革的实质就是杀贫济富，贫是劳动者，富是资本家和专制政府。资本家拖欠应缴费用，特色专制政府把本应用于劳动者医疗支出的财政资金用于自己的干部医疗，于是劳动者本就过低的医保费用仍然面临压力，不得不挪用其个人账户。

此外还应注意到专制政府利用医改分化群众的一面。专制政府对个账改革的解释中，堪称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健康群体“当期收入”会减少，而对治疗费用每年大于4000元的老年人，则有每年新增千元以上的补贴。这些补贴自然是出自从健康群体中剥夺的个账资金。专制政府的遮遮掩掩并不能够缓解群众中广泛存在着的对医保资金池即将耗空的焦虑，而随着医保资金情况的恶化与更多信息的暴露，群众的担忧愤怒情绪只会加强，健康群体也会产生对未来老无所依、医疗保障彻底崩溃的焦虑。这只会引起、并且已经可见地引起了青年人和老年人、看病群体和健康群体的对立。

但是，我们上述的说明充分证明了，专制政府的这一举措不过是为了掩盖政府对资产阶级的无能、软弱、妥协与袒护，对群众生命健康的轻视。这些虫豸最后的可怜的智慧，只用在抢夺青年人的财产，再把它施舍给劳碌一生、满身病痛的老年人，并无耻地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善心”顶礼膜拜。归根结底是试图转移矛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卑劣行径。革命左派应该彻底地揭露专制政府的反动本质，揭露其劣拙的谎言，组织无产阶级并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号召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全民免费医

疗、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政府而斗争。同时在争取免费医疗的斗争过程中要对群众进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和锻炼，为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做好准备。

四、斗争与改良：群众斗争才能保证改良方向有利于无产阶级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次所谓“改革”，不过是修正主义政府为应对医保资金断裂的危机试图做出的微小改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改良？我们的原则是，要清醒地利用每个改良机会，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 “革命者永远不会拒绝为改革而斗争，不会拒绝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个别的阵地，只要这一阵地能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和有助于取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有时敌人自动让出某一个阵地，正是为了瓦解进攻者和更容易地击溃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有时刻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运动”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运动不迈错步和不犯可耻的错误。”（《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接下来我们列举一些2月8日到2月15日间发生的事实，这是武汉群众通过斗争取得的初步结果。在武汉的官老爷们下达他们对退休职工的判决前，不仅没有任何能让群众接收到的说明（比如他们后来做的那样，发消息或者入户宣讲），也没有考虑这些活在病痛中的人们如何便捷地得到那宽宏大量的判决书上写明的利益。让我们看看财新的报道：

> “多位武汉市退休职工向财新反映，自己平时很少去门诊.....一方面，门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医疗”现象，动辄检查、拍片的高昂费用让他们心生抗拒。另一方面，门诊就医流程繁琐、等待时间长.....相比之下，普遍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老人更倾向于在药店买药.....”

> “2月13日，武汉市医保局.....在544家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和29家定点零售药店试点的基础上，新增138家社区卫生服务站、1000家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保障范围.....15日又将第三批4065家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服务试点。”

也就是说，没有2月8日的运动，负责顶层设计的优秀领导们、学历傲人的幕僚们，这些人民的先锋竟然想让退休老人们每次开药都要去跑一次特定的门诊，而不能凭处方在药店买。而且还要他们跑到更远一些的少数试点医疗机构与药店。

除此以外，2月11日，武汉对民众许下承诺，例如：①将增加医保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保障病种，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特殊疾病病种由28类增加到37类，基本病种从32种增加到70种，②完善日间手术医保报销政策，目前门诊23种日间手术可以医保报销，下步还将不断增加报销病种数量（吊诡的是四天后，新华网已经大大方方地将这第一点作为优秀范例向全体人民宣传了）。

但这种承诺的兑现有赖于人民的监督，甚至上文中已经发文确定的举措，能否在现实中正常实施，也依赖于阶级力量对比，依赖于群众的力量，即群众的组织程度。但是在中国这种舆论高压管控的专制社会，难道群众能够很轻易地通过公开渠道互相交换意见，进而产生共识，最终组织起来吗？难道面对专制政府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群众能够进行公开的、广泛的商议与准备游行事项，号召他人参与游行

示威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群众一旦试图组织起来，必然会遇到缺乏政治自由的问题，必然会产生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诚然即使在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国家里，政府有时迫于群众运动也会进行一些重要的经济改良，但群众如果不组织起来将无法保证这些经济改良最终能落到实处，无法保证在经济上升时期给出的让步不会在经济萧条时被收回。对革命者而言，要警惕的则是以缺乏政治自由为借口回避组织工人的任务。组织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在政治自由条件下能够更顺畅地进行，但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也应通过秘密报刊和秘密组织开展起来。

武汉老职工的行动告诉我们，通过游行示威、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微小意义的经济改良，群众们组织起来不停地踢着官僚们的屁股，才能让官僚们向前动一动。但这样的成果随时有可能被专制政府收回，而觉悟的人民，尤其是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会满足于微小改良和经济性的游行示威的。只有通过全国政治报、集中制政党、工业化灌输建立强大无产阶级队伍，彻底推翻专制官僚统治，才能实现免费医疗等民主主义诉求，从而为彻底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五、地火奔突：今天的反抗只是未来更大斗争的开始

这次由于对政策的“误解”或“不解”而产生的运动，会随着它表面起因的消解而停止。但武汉的两次游行，不过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某个细小侧面进行展开与收束，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矛盾在中国的特殊运动。

这个运动到达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意识到矛盾正在不断尖锐，逐渐自觉地尽力伸张触角、侵犯社会空间，以强化自身的力量，试图镇压社会矛盾。过去三年的危机给了它取得表面彻底统治的可能性，但愈发完备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得不在应对每一个细小矛盾时愈发暴露其阶级本性，逐渐作为广大劳动群众绝对的对立面而存在。2022年底变化的客观形势（奥密克戎高传播性+群众运动）使它嗅到了失败的气味，它试图狡猾地借坡下驴挑动群众内斗，但雪亮的眼睛将它一切所作所为都尽数记录下来。

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人民已经不再是疫情之前的人民，种种官僚主义恶行激起了群众的怒火与反抗；英勇的11月群众运动已经打破了专制政府对示威者的恐吓；从疫情封控到全面放开的急速转变、随后大规模的感染挤兑与医药短缺，向所有人证明了专制政府的无能，展现了治理能力的大溃败，至高无上的权威跌落凡尘，人民深埋心底的愤懑日渐燃起。

因此如果官老爷们与资本家们为成功镇压了反对医改的抗议而松了一口气，认为一切恢复秩序井然，想要坐在豪华的真皮座椅上，在无所事事的午后享受着用工人农民的血汗买来的芳香清茶的时候，人民的呼声就会再次响起，把它们吓一个趔趄，茶水洒在他们那精致的衬衫上，浸在他们身上，就像工人的血浸透作为资本代表的机器，这呼声将一次次地更响亮地响起，直到革命的浪潮席卷一切。

不过在那之前，不妨让官老爷与资本家再做做他们那个千秋大梦，而矛盾正在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新事物正在旧事物的胞体中孕育，现实的运动正要求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作为火星投入其中，无产阶级需要组织起来。

地火！地火在熊熊燃烧！